



贺大龙深入解读上党地区文化遗产。本报记者 牛红岩 摄

第一百一十五期上党文化大讲堂开讲

探文化遗产个性 续千年文脉传承

本报讯 记者王涵报道：古韵绵长，文脉不息。5月24日，由市委宣传部主办、市文旅局轮值承办的2025年第2场、总第125期上党文化大讲堂在潞州区图书馆正式开讲。本期特邀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、山西省古建筑协会秘书长、山西省“三晋英才”拔尖骨干人才贺大龙，以“上党文化遗产的个性”为主题，带领听众深入解读上党地区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与保护实践，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。近200位古建研究者、文保工作者和文化爱好者聆听讲座。

本期大讲堂主讲嘉宾贺大龙深耕古建筑保护领域40余年，主持或参与近百项国家级、省级文物保护项目，其主持修缮的陵川县小会岭二仙庙、平顺县天台庵等工程获评“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”。其学术专著《长治五代建筑新考》曾获山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，多篇论文发表于《文物》《中国文物报》等权威刊物。

此次讲座从文化遗产概况、文物价值简释、活化展示路径等多个方面展开，结合丰富案例，深入剖析上党文化遗产的独特个性。贺大龙对早期木结构古建筑的时代特征、不同类别古建筑的地域分布，以及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的活化利用等内容，进行了全面细致地讲解。此外，还回顾中国近代文物保护事业的开创历程，分享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及长治地区文物保护的重大成果，为公众勾勒出一幅文物保护与发展的历史画卷。

当日，讲座现场座无虚席，听众反响热烈，纷纷表示受益匪浅。在互动环节中，贺大龙针对现场提问耐心解答，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，共同推动上党文化的发展。



贺大龙接受本报记者专访。本报记者 牛红岩 摄

飞檐翘角承古今 上党遗韵续长歌

——访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、山西省古建筑协会秘书长贺大龙

本报记者 王涵

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上党地区更是古建筑与文化遗产的“活化石”。贺大龙在访谈中表示：“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为了守护历史的根脉，更是为未来留存文明的基因。希望通过此次讲座进一步激发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与热爱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的文化记忆。”上党文化遗产的独特个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？上党地区古建筑保护压力巨大，未来应如何突破困境？讲座结束后，本报记者对主讲嘉宾贺大龙进行专访。

“沉重”的上党文化遗产

记者：贺老师您好，首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。我们注意到，讲座中您用“沉重”一词形容上党文化遗产，这个词有着怎样特殊的含义？

贺大龙：“沉重”一词，包含着多层含义。一方面，从历史承载角度，上党地区的文化遗产极为厚重。山西临汾、运城、长治、晋城四个城市的不可移动文物占据全省总量的50%以上。临汾和运城以史前文化，如尧舜禹时期的文化遗存为特色，而进入实物阶段后，上党地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。自唐代佛光寺之后，唐至元早期木构建筑的存量重心便转移到上党地区，历史文脉传承完整且意义重大。从现实角度看，庞大的遗存数量与有限的保护资源形成尖锐矛盾。

另一方面，“沉重”也反映出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。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阻碍。比如在城市道路修建、新区开发过程中，古墓葬、古遗址的保护与建设发展之间矛盾突出，面临着“留”与“建”的艰难抉择。上党地区木结构建筑存量巨大，大量低级别古建筑保护缺乏专项资金支持，面临自然损毁风险，保护工作压力巨大。此外，专业人才短缺，导致许多古建筑未能得到及时的科学修复和修缮。

上党文化遗产的“个性”

记者：为何强调“上党文化遗产的独特个性”？其具体体现是什么？

贺大龙：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识。山西作为文化遗产大省，不同区域的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了差异化的文化内涵。上党文化的“个性”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与历史脉络。从秦始皇设

“上党郡”起，这一区域便形成独立的文化单元，涵盖长治、晋城两地，以太行山、沁河及漳河流域为核心。地理的特殊性使其文化遗产保留了原真性，尤其在建筑领域，上党地区承载了中国唐宋至元代最辉煌的木构建筑史。

独特性体现为：历史衔接的关键性，上党建筑填补唐至宋的转型空白。如平顺县龙门寺西配殿、大云院弥陀殿等五代建筑，是衔接唐代南禅寺、佛光寺与宋代崇庆寺的“活化石”。若无这些遗存，中国建筑史将出现断层。建筑技艺的典范性，上党木构建筑代表中国古代土木技术的巅峰。例如，长子县崇庆寺千佛殿完整保留宋代早期形制，其斗拱结构、梁架设计真实性与完整性无可替代。文化历史的独特性，建筑与艺术的结合是文化个性的综合表达，而上党地区完整保留这一体系，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土木建筑和中华文化的不可替代样本。

这些文化遗存不仅证明上党是唐宋建筑转型的核心区域，更与诗词、书画等艺术领域的转型形成呼应。例如，五代时期的建筑形制变化，与唐诗到宋词的过渡同样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。若无上党文化遗产，中国建筑史将出现“断代”，难以理解唐宋木构技术如何衔接。

上党文化遗产的个性不仅是地域标签，还是中国建筑史不可或缺的篇章，其价值在于完整书写从唐至清的木构技术演变史。

上党文化遗产的“新生”

记者：上党地区古建筑保护压力巨大，未来应如何突破困境，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双赢？

贺大龙：目前，我们在多方面积极探索应对之策。在政策层面，严格遵循国家文物

保护方针，推动地方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古建筑保护条例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加强对建设项目建设中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环节的监管，平衡好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。在资金筹措上，除争取国家和省级专项资金外，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，通过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基金、引入企业赞助、探索“古建筑认领修缮”“文旅融合开发”等模式，让古建筑在合理利用中实现“自我造血”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。同时，探索社区参与模式，通过培训当地工匠、鼓励村民参与日常维护，解决人力短缺问题。其次，加强数字化保护。利用3D扫描、VR技术对古建筑进行高精度记录，既能留存历史信息，也可为修复提供科学依据。最后，增强文化认同感，加强与高校、科研机构合作，开展古建筑保护技术研究，培养专业人才，提高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。通过文化讲座、研学活动、文创产品开发，让更多人了解上党文化遗产的价值，形成全民保护共识。

记者：上党文化遗产对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呢？

贺大龙：上党文化遗产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。从文化建设层面来说，它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源泉。深入挖掘和传承上党文化遗产，能够让人们了解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激发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，进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，文化遗产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经济动力，通过合理开发利用，如打造文化遗产主题旅游线路，将上党古村落、传统手工艺作坊等串联起来，既能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，带动餐饮、住宿等相关产业，增加就业机会，也能让更多人走进上党，了解上党文化，提升地区文化影响力。